

目 录

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云浮农民运动	
概况	……县党史办 (1)
二、大革命时期小河乡的农民运动	……曾善人 (7)
三、回忆“抗先”云浮独立支队	……余渭泉 (10)
四、云浮县“都骑妇抗会”的回忆	……李君怡 (19)
五、活跃在西江边上的抗日武装四乡联防队	
	……县党史办 (22)
六、民国时期云浮教育发展初探	……唐绍灿 梁季华 (25)
七、蓉华中学创办前后概况	……曾以枢 (30)
八、辛亥至建国期间我邑知识分子概况	……区应铨 (32)
九、民国时期云浮县人赴国外留学生一览表	
	……梁 元 (36)
十、清末民初我邑学者诗人梁树勋	……梁 元 (38)
十一、黄善初先生与培儒书院	……口述：张元明
黄耀南 整理：朱秀源 冯仲华	(42)
十二、关于朱廷材先生的二三事	……苏时雨 (44)
十三、云浮中学图书馆	……陈以信 (47)
十四、回顾清末和民国时期的商会组织	……袁锡勋 (49)
十五、解放前云浮的当铺业	……袁锡勋 (51)
十六、刘北匪帮抢劫云城录	……梁春华 (52)
十七、云浮县河流及航运史略	……冯世廷 陈章保 (54)
十八、云浮蟠龙洞简介	……范昆廷 (62)
封面题字：秦尊生 封面设计：范昆廷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云浮农民运动概况

中共云浮县委党史办公室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合作。革命形势推动了全省的工农群众运动的迅速发展。云浮的农民协会和全省各地一样，在部分区、乡迅速发展起来。

农会的建立

一九二四年八月，云浮县的进步青年陈世聪、吴金祥、廖永成等人参加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二期学习班，陈启明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参加了第三期学习班的学习。他们系统地学习了农民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成为云浮农民运动的骨干。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选举产生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执行委员会”并发表了《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农民运动在全省各地蓬勃开展。在这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在广州、香港、佛山等地工作的云浮人，受革命浪潮的影响，也先后回到家乡组织农民运动，成立农会。不久，受广东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派遣的农运骨

干罗顺球、陈世聪、廖月进等也陆续回到腰古、小河、安塘、思劳一带组织农民运动。他们发动了进步青年程雄才、张誉等人加入骨干队伍。不久，在水东、茅坡、小河、吉洞、新村、芙蓉、双稳、城头、古宠、安塘、布贯、桐围、罗斗等乡村相继成立农会。廖月进等经常去联系，做宣传发动工作。与此同时，进步工人李灶、李桂庭也从香港、佛山回到家乡，在路心村一带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协会。农会很快遍及双羌、荔枝屯、白村、赤村、河口、庙村等乡村，农会会员数以千计。

一九二六年春，共产党员周其柏受广东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的派遣，率领革命青年数人到我县，从接近高要，佃农较多的腰古入手，组建了七个乡农会，在筹建中的还有九个。肇庆宣传员养成所学员陈凤浩等进步青年经常在杨柳、石巷等乡村树起“犁头旗”，向农民宣传农会宗旨，做发动群众工作。在云城，上至桐油墩、大坎，下至横岗、牧羊塘，南至土门、云楼等地都建立了农会组织，并开展了活动。影响较大的有赖懋卿、吴迪元等在云城发动组建的“云城农会”。

各地农会成立的时候，会员们个个头戴铜鼓帽，胸佩农会证章，农军的成员还携带武器参加农会成立大会。会场多数设在各乡村的大祠堂。会场正中高挂着孙中山先生遗像和“犁头旗”。大会开始时宣读《总理遗嘱》，后由农会负责人讲演农会宗旨。不论那个乡村农会成立，其他乡村农会或农会的筹备小组都派代表到会祝贺。

农会的发展

一九二六年一月，广东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成立，中共

西江地委也同时建立，周其鉴任地委书记，领导西江人民的革命斗争。于是，各县的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纷纷宣告成立。云浮的腰古、小河分区农民协会也在这时相继成立。同时成立了农军常备队。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腰古、小河分区农会还派人深入安塘、思劳、云城等地组织农民协会，还训练了一批农军，集中在分区农会所在地。各乡村也招集了部分精壮农民作为农军的后备队。

一九二六年夏秋间，广东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主任韦启瑞和办事处的周其柏、罗顺球等人经常来云浮指导工作，成立云浮县腰古农民协会指挥部。指挥为程雄才，副指挥为张誉，成员有李灶、吴镇南等八人。一支由二十多人组成的农军常备队，直接由指挥部指挥，程雄才兼任常备队队长。农军常备队负责维持社会治安秩序，保护人民生命财产，还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凡乡村成立农会，他们就携带武器前往祝贺，以显示实力，造成声势，扩大影响。

农会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三、四月间，新兴县同安堡张姓大地主阴谋制造粮食大饥荒，把囤积起来的一千多担粮食全部武装押运出去。腰古、小河农民得知了这个消息后，根据广东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的指示，在程雄才、张誉的领导下，带领三十多个农军队员，一千多农民群众，把守着小河口至腰古河段，勒令他们停航，他们不从，农军打死了押运粮食的保镖，截扣了粮食。这次斗争的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农民的革命斗志。

一九二六年农历五月上旬，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向小河分区农会发了“二五减租”的通讯，分区农会立即召开了分区农会委员会议，作出了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运动开展起来了。小河附近新兴县磔村的恶霸地主张鼎初，有很多田地分布在小河垌面。佃农要减租，他拒不答应。一日，他手拿驳壳枪，带领二十多个爪牙，杀气腾腾地闯到小河分区农会办事处。分区农会主任张誉见状，立即命令农军，拿起武器，埋伏在分区农会办事处周围，准备随时投入战斗。张鼎初窜进农会办事处后，恶狠狠地质问分区农会主任张誉：“佃农租田种有什么理由不按旧例交租？你们要搞什么‘二五减租’，简直是妄想！”张誉立即义正词严地据理给予驳斥：“农民终年辛苦，一日连两餐稀粥都吃不上，有什么能力交租？而你们却不劳而获，整天拖烂鞋，吸尽我们农民兄弟的血汗，减租有什么不合理？现在实行‘二五减租’是全省农民代表会议决定的，是上级农会的指示，我们坚决照办！”张鼎初气急败坏地举高驳壳枪威胁说：“喂！你们这样做，先得问问这家伙答不答应”。张誉也毫不示弱，针锋相对地说：“你如果不答应得要问问我们农军同意不同意！”这时候，吴镇南、李家祥等带领着几十名威武英俊的农军拥了进来，并把枪栓拉得瑟瑟作响。张鼎初见势不妙，带着其随从爪牙一起狼狈溜走。从此，“二五减租”便顺利地开展起来。

腰古城头村农会主任李绍全，组织了一支一百多人的农军，高呼“打倒地主豪绅，反对苛捐杂税”的口号，斗争了村里的几个大地主，收缴了地主长短枪共十多支，实行了“二五减租”。

小河公局局绅麦容舫、李旭初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无恶不

作，包烟庇赌，敲诈勒索。一九二六年夏秋间，小河分区农民代表会决定没收他们所有的财产归农会掌管。但是，反动的地主阶级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伺机进行反扑。一九二七年二月，他们假装拥护农会，以“防匪盗，安百姓”为名，组织了反动民团和警察，一边暗中勾结土匪和武装地痞，一边安插爪牙混入小河分区农会。一天，混入农会的地主爪牙孔仲岐、董以盈带着几个冒充上级派来的人，撤换了分区农会办事处的全部人员，篡夺了农军的领导权。当农会骨干发现了上当时，立即组织起来，展开斗争，收缴了他们的武器，夺回了小河农会被篡夺了的一切权力。

在此期间，思劳、安塘、云城一带乡村农会也积极开展“二五减租”和组织农军的活动。

农民的暴动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叛变了革命。四月份，国民党反动派在广东全省各地血腥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革命运动。省农民协会西江办事处主任韦启瑞被国民党反动派扣留了，这消息传到云浮，腰古、小河农民协会，广大会员个个义愤填膺，准备联合高要县的农民，组织营救工作。

五月十四日，腰古农民协会指挥部立即采取果断措施，下令扣押了国民党反动警兵署长赖祝三及反动警兵数名。十六日，在腰古墟集中了小河分区武装农军二百多人，腰古分区武装农军二百人，思劳等地农军和农协会员二千多人，准备在午饭后公审处决罪大恶极的反动头子赖祝三，然后举行武装暴动。是日中午，正当人们准备吃午饭时，反动团长云瀛桥等调

驻肇庆机关枪连及该团办公厅连全部官兵从新桥向腰古袭来。程雄才见状立即指挥数百名农军全副武装紧急集合。不一会，敌人已从水东方向压来，敌的机枪扫向农军。程雄才、张普立即率领农军登上腰古后面的后龙山、虾山，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交战近两小时，终因敌强我弱，农军被迫撤离阵地，分散隐蔽起来。腰古农民协会指挥部以及腰古、小河、云表、水东、芙蓉、思劳、路心等乡村农会会址和农会骨干的家庭惨遭敌军破坏，有的甚至被烧毁。敌人还出花红悬赏逮捕农会负责人，勒索被捕者家人的钱财。

由于敌人的狡猾加上当时农会缺乏斗争经验，一批农会骨干惨遭杀害。程雄才躲到云表坑山寨后，被坏人告密，不幸被捕，农会骨干李灶也被骗落入敌手中。不久，这两个腰古农会的骨干惨遭杀害。事隔半年，农会骨干张普也因叛徒告密出卖，受骗到云浮与新兴交界的迳口村山塘边惨遭杀害。

腰古、小河农民的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布取缔安塘、云城一带的农会，缉拿农会骨干。一九二七年七月五日云城农会主要骨干翟懋卿、吴迪元被骗到云城“宾兴馆”，云浮县长刘学修以“砍农头”为名，杀害了他们。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反扑，使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运动转入了低潮。但它有力地打击了反动派的嚣张气焰，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志，积累了斗争经验，为后来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达勋整理

大革命时期小河乡的农民运动

曾 鲁 人

一九二六年，共产党领导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大革命的光焰照亮了全中国千千万万被压迫被奴役的贫苦农民的心，也照亮了小河农民的心。在北伐战争胜利形势的鼓舞下，在湖南农民运动声势的影响下，沉默的小河沸腾了。

领导小河乡农民运动的有张誉、李强、吴江、程雄才等同志。张誉是肇庆中学毕业的学生，李强是广州的理发工人，吴江是农民，程雄才是上级派回来的干部。除程雄才是腰古乡人外，其余都是小河乡人。

小河乡开展农民运动的第一步工作是建立乡农民协会和村农民协会。乡农民协会由张誉任会长，在乡农民协会的组织下，乡内三十七个自然村都先后成立了农协分会。农协会的旗帜是红色的，旗中有黄色犁头图案，所以叫“犁头旗”。第二步工作是在农会的领导下，收缴地主豪绅的枪枝，并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农民自卫军，简称“农军”。

乡、村的农会成立时，各村农民都互派代表到会祝贺。在夏秋间的一天，乡农会举行了一次向地主豪绅显示农军威力的示威游行。青壮年农民全副武装，精神抖擞地参加游行。队伍游经各村落，高呼“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减租减息”的

口号，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战歌。次日，乡农会为灭地主豪强的威风，长农民的志气，农军还捉了那些横行乡曲的地主恶霸，给他戴着高帽子游村，农民兄弟见了无不拍手称快。游村结束，即在小河墟开群众大会，宣布对地主恶霸刘甲（混名大脚甲）和刘二（混名大吊二）兄弟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从此，地主恶霸威风扫地，农民志气昂扬，使减租减息运动顺利开展起来。

为了提高农民的觉悟，乡农会又在各村成立识字班。识字班晚上上课，村中百分之九十的群众都来参加。乡农会选派进步的知识青年当教师。张誉、李强、吴江常到各识字班向农民宣讲革命道理。农民既识了字，又懂得了闹革命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一批积极分子加入了共产党。这些共产党员，后来成为各村农会的骨干。

在小河乡农民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腰古、安塘、罗坪等乡的农民，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参加了斗争。为了拔除云浮县警察局派驻小河墟的据点，农会干部指挥农军在一个晚上突然袭击小河警察分驻所，缴了警察所的全部枪枝，并捉了分驻所长赖祝三。小河农军的胜利，鼓舞了腰古、安塘等乡的农民，他们纷纷行动，收缴警察、地主的枪枝，武装自己的队伍，壮大农军力量。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镇压革命，屠杀革命人民，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随后广州武装起义也失败了。这时云浮的地主武装在反动头子刘学修的指挥下，配合国民党派来的军队，向小河及腰古的革命农民反攻倒算。小河乡的革命形势和全国各地一样，暂时转入了低潮。

小河乡农民运动的领导人、农会会长张誉在革命失败后，不幸被杀害了。

在这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搏斗中，程雄才率领农军在腰古墟与当地的地主武装、县政府派来的反动军队激战了一天一夜，直到弹尽援绝，后不幸被捕。在腰古墟的一块空地上，刽子手用尖刀剖腹杀害了他。程雄才在敌人的屠刀面前，脸不变色心不跳，正气凛然。临刑时他从容地向乡亲告别，昂首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胜利永远属于人民”的口号，不愧为勇敢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革命人民是杀不绝的，在解放战争时期，小河乡的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又重新组织起来了，他们拿起刀枪，高举红旗，加入全国人民革命的伟大行列，英勇战斗，终于和全国人民一起取得了革命的最后胜利。

回忆“抗先”云浮独立支队

余渭泉

一九三八年入秋以后，我带着一个由西江各县抗日武装联合组成的政治工作队在肇庆、云浮、新兴各地巡迴。十二月我在新兴接到“西特”的通知，说周明等同志已从云浮调走，要我偕同徐枫、李君怡等同志返回云浮，稳定下来，搞好党的建设。一九三九年一月，我遵命返回云浮建党。临行，“西特”组织部长又是“抗先”副总队长）梁嘉同志在“抗先”总队部西南办事处约见我，向我作了有关建党工作的具体指示。其中着重阐述了当时政治形势正处在革命高潮，应该大刀阔斧开辟工作。既要小心谨慎，遵守“秘密工作条例”，又要反对关门主义。认为先用“抗先”这个组织形式，把爱国的、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发扬他们的先锋桥梁作用，从而向工农敲门，这条路子是对的。指示我们回到云浮马上就把“抗先”这面鲜明的旗帜打出来，吸引广大的抗日爱国青年同我们一道前进。

见过“牛哥”（即梁嘉同志），我们马上就离开新兴返回云浮。回去初期，我们还是以第四战区动员委员会战时工作队的名义拉关系，按照“西特”的布置，先到云浮县民众抗敌后援会找潘维尧（潘是我们的“统战对象”，三八年夏天周明同志带领“抗先”第十七队到云浮活动，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进去

的)，但那时“后援会”已从云都车站迁往西街，潘维尧也已转去筹办“国民兵团”。幸好我们打着四战区动委会战工队的旗号，加上同乡关系，“后援会”对我们热情接待，给我们安排好食宿（只收我们四块钱伙食费）。住处安定后，我们马上就到城里的政府机关、驻军队部、学校社团分别拜会。这次拜会，我们以四战区战工队和“抗先”两个名义双重身份进行，以利工作开展，主要还是为“抗先”争取公开合法社会地位。

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是年二月，一位积极抗日、倾向进步的教育界老前辈乡亲陈思虞从粤北回乡过春节，在县城见到我，知道我们在组织“抗先”，对我表示鼓励支持。第二天又来找我，要我跟他一起到云中，与云中校长陈显光倾谈。我先谈了“抗先”的政治主张，主要是谈了青年抗日爱国统一战线，主张国共合作，共御外侮，宣传当前发展“抗先”组织的重要意义。陈思虞老师肯定地说，“抗先”是当前最好的最有活力最有前途的青年组织，是爱国的先进青年团体。要在云中先进学生中发展“抗先”队员，在云中学生广泛开展抗日爱国思想教育。陈显光校长同意我们的说法，表示欢迎我们到云中活动。大家谈到投契之处，陈显光校长竟提出聘请我到云中当教员。我婉词推却，他还是再三邀请。最后由陈思虞老师建议，我到云中做个兼钟点教员，搬进教员宿舍住，以便接近学生。我只好答应了。结果我住进了“乡祠”，名义上是教《公民》，实际上是向青年学生进行抗战宣传教育。我还记得，当时主要是根据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编了一些讲义。回顾这次同老前辈陈思虞、陈显光接触交谈联系，无疑是在云浮建立“抗先”县级组织，跳出“云北”圈子，开展全县性的青年运动的第一个突破。

我搬进“乡祠”居住之后，的确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经常到来探访座谈，其中相当一部份可能是麦长龙荐引来的。麦长龙是“都骑一小”毕业后考上云中的学生，在都骑时已受到一定的进步影响，由于他同我原来已是师生关系，我搬进“乡祠”居住后，他差不多天天都到我的房里倾谈，我抓紧帮助他提高觉悟，因此，他很快就带头第一个参加了“抗先”，并报经“抗先”总队部西南办事处同意，又很快被选拔为云浮“抗先”的副队长。这个过程不断引起云中的青年学生的思想振奋，跟着一批批的参加“抗先”。这也可以说是当时云浮青年运动的又一个突破。

“抗先”一开始就是大张旗鼓公开发动的。最初，我们主要是采取大量张贴“海报”，写马路标语等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和组织。虽然最初我们在云城仅三、四个同志，但几个都是从部队搞政工转回来的，有干劲又有技能，群众对我们有好感。黄芹记印务所的职工和我们的关系很好，有两个青工参加了“抗先”。自从云中大批学生参队以后，我们的力量更充实了，除了能抽几十人去支援驻军挖掘战壕等等，还能办起一个大型墙报，定名为《云浮抗先》，群众反映很好，说墙报的内容充实，文章短少有力又通俗，每期都吸引了不少读者。

三、四月间，“西特”通知我去新兴汇报工作，朱荣同志带我去见王均予。当时，我还没脱下军装，佩着短枪。朱荣把我介绍给王均予说是个有枪的同志，王均予因此对我特别感到兴趣。他听完我的汇报后，给我作了全面的指示，其中特别着重指出，说我们云浮有个云雾大山，可以到那里建立游击根据地。要我先派几个“抗先”同志深入下去调查了解，同那里的农民扎根联系。并说，云浮“抗先”不一定学郁南等各县建立

县队部，就称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云浮独立支队，像个军队组织形式，指挥也比较灵活。我都表示遵命照办了。

机遇非常好，我回到云浮不几天，就在云城李晚烈士公园内找到一间空着的小小的两层的白洋房，我们索性搬进去作队部，挂起了“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云浮独立支队”的牌子。整个李晚公园都成为我们“抗先”的活动场所了，常常有很多青年男女学生都在那里集会活动，有时我们“抗先”还同部队在那里联欢，很是热闹。

跟着，从肇庆来了一个“抗先”干部，名叫李浩（前年才在顺德大良离休）。他找着我，说云浮县社训总队副队长李端是他的哥哥，大革命时是我们自己人，大革命失败后断了关系，他表示愿意支持“抗先”，靠拢组织，我们表示欢迎。当天，经李浩的介绍，李端到“抗先”队部和我们联系上，他要求我们派三至五个“抗先”队员到社训总队当指导员，我马上答应了他，并建议他们先到富林乡（云雾山区）开展社会军训，他也当即同意了。我们就派了徐枫、徐锡怀、麦锡金、李君怡等几个同志到社训总队当指导员，和他们一起到了富林乡去。我们公开是到富林搞社会军训，但主要还是到云雾山区扎根串连，调查那里的地形地物，贯彻“西特”的指示，准备到那里建立游击据点。但在云雾山区活动仅一个月左右，我县地下党领导机关内部对这种做法、步骤产生不同意见，主要是组委陈孔嘉认为应该首先集中力量搞好县城“抗先”的组织建设，他的意见得到“西特”杨普的支持，结果把徐枫等几个同志从云雾山区抽调了回来，建立游击据点的设想遂成泡影。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我们把徐枫等几个较强的干部抽调回来后，县城的青运的确有所增强。“抗先”副支队长麦长龙

和一批云中中学生“抗先”骨干可以调整出来，让他们专心一意搞好“云中抗先”分队。使“云中抗先”在一九三九年下半年队员在数量上有很大的发展，在素质上也有很大的提高。

回忆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云中的一个进步教员朱廷材老师，他当时对“云中抗先”的发展和提高曾给予很大的帮助。他不仅对“抗先”在云中的活动处处给予方便和维护，而且对共产党的活动也暗中支持。我记得，是他最早把《中国共产党英勇奋斗十五年》一书，（即抗日战争以前建党以来十五年的党史）引进云浮并推荐给云中中学生阅读的。在往后逆流侵袭，危难的日子里，他又曾给“抗先”，给“抗先”领导人，给我和麦长龙等同志打过掩护。对于像朱廷材老师这样同我们肝胆相照的知识分子，我们是忘不了的。

“抗先”本身是个青年统一战线的组织。它又很重视统战工作。回忆当时云浮“抗先”同国民党云浮县政府的统战关系还不错。记得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我们云浮“抗先”在县城马坪广场召开了一个“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反对汪精卫投降卖国”的群众大会，县长刘尚需也应邀出席大会并讲了话。而且肯定“抗先”是个抗日爱国的青年团体，表示支持我们“抗先”的各项活动。

“抗先”云浮县独立支队，自始至终都是我当支队长，但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党的建设任务繁重，党内安排“抗先”工作主要由青委徐枫同志以副支队长的名义负实际责任，我只是挂个名。上半年全支队队员共约一百人。云城方面（包括机关职员、企业青工和云中中学生）约七十余人，初时称“云城分队”，由麦长龙同志以副支队长名义兼分队长。都骑方面（主要是青年教师、年长学生和少数校工、青农）约三十人。

称“都骑分队”，麦冬生同志任分队长。下半年两个分队都有较大的发展。九月份，云中搬上太空岩，独自成立一个“云中分队”，分队长仍由副支队长麦长龙兼，分队部设在岔路铺，队员发展到一百余人。县城留下十来个队员，主要是机关职员和企业青工。“云城分队”的名义已不再用，但也没声明取消，由副支队长徐枫直接分组领导或个别联系。“都骑分队”由于分队长麦冬生采取大办夜校，吸收青年农民、小学校工校友入学，“抗先”派人去上文化课和政治课，还教唱抗日救亡歌曲，夜校学生觉悟提高较快，不少人要求参加“抗先”，使“都骑分队”的队员迅速发展将近一百人。在一九三九年底一九四〇年初统计，“抗先”云浮县独立支队的队员总共是二百余人。

云浮“抗先”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是充满着斗争的。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云浮县党部曾通知所有民众团体到县党部开了一次会，说为了统一意志集中力量加强对日抗战，要求各民众团体自动解散，把自己的队员会员三十岁以下的拨入“三青团”，三十岁以上的介绍参加国民党。并要求我们“抗先”发挥先锋作用，带头行动做好这件工作。我一听就知道这是恶意，矛头是针对我们“抗先”的。其他单位的代表听到，大家都默不作声，一双双眼睛朝着我看，等着我发言表态。我面对着国民党县党部这个严重的挑战和与会的各单位代表们的期望，由于事前“抗先”总队部西南办事处已作过应变斗争的布置，我思想上已有所准备。我就从容地站起来作了一个明确的发言。我说：我们支持三青团坚持团结抗战，我们“云浮抗先”可以在保持组织上的独立性，并请示“抗先”总队部获得批准之后，以团体名义参加三青团。（一九三九年夏，“抗先”

总队部西南办事处曾给我们作过这样的指示）我认为，我们的抗战是全面抗战，全民的抗战。蒋委员长早就说，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少（当然也就无分男女）都要起来抗战。民众运动既然如此大规模，自然就需要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民众团体多式多样才好。国家兴亡，匹夫匹妇都有责，抗日何须独一家？我的发言赢得了各出席单位的代表的同情，接着是县妇女会的同志发言，表示赞成“抗先”的意见，其他单位也有相同的意见。但不知从何来了个五十来岁的绅士，他却在会上大发雷霆，竟说既主张联合，又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这是共产党的论调。这样就迫使我再站起来讲话。我说：我们大家在这里讨论研究，应该让大家畅所欲言，现在大敌当前，我们要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不要制造矛盾，互相攻击，也不要把所有合理的良好意见和主张，都说是共产党的言论，难道国民党就一无是处！讲到这里，各单位的出席代表大都觉得我这番话是在挖苦国民党县党部。有人在掩着口窃笑；有人感到顽固派代言人讲话理亏，争辩下去更孤立，不想展开讨论；中间分子怕争辩起来太激烈，不可收拾。思想反映相当复杂。但大家都只是简单地讲了一句半句就没有人发言。国民党县党部出席会议的主持人又显得低能，竟问大家继续不继续讨论，大家不等主持人决定，立即就退席离场，自动散会。国民党云浮县党部第一次发动解散“抗先”的阴谋遂没得逞。

但国民党云浮县党部并不甘心失败而收手，他们觉得“抗先”云浮独立支队在云城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同政府机关和驻军团队都有统战关系，特别是有它自己的上层组织——广东省青年抗日先锋队总队部和西南办事处，不易一下从上而下加以破坏。他们就决定改变计策，采取由下而上来动摇我们的基